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二五期 ——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911b)

【难忘岁月】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陈丹青
【遥想当年】	一九七六年的记忆	朱学勤
【往事如烟】	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	葛 岩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难忘岁月】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

• 陈丹青 •

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12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9月9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

位老同学干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14岁——1976年我满23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气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什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要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种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勃·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章被指定从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1976年9月9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分，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象呢：先是他与黄、李、邱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1971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副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记录片《中国》。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2004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曲。我也现在明白，为什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记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记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1966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绝决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记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瘫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愈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

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1972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雇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绣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著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累累，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什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1934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炆

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仿佛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悍：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鸡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鸡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仿佛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鸡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谨，口粮限制仍

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榔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1975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踟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外郊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毗，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袒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裤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悚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什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每户被十五或二十支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 y 已告缓和，七十年代仿佛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减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1971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鸡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36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竖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1992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启动的刹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刹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

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1949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启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69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1970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1971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1972年初，我从蚊帐收听到美国人来了，局势缓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复歌舞表演和全国美展。

1973年，各省出版业渐次恢复，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调绘制连环画，走出山沟，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两位才子：描绘《开国大典》的内控右派董希文，描绘土地改革，来自延安的革命画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1974年我被告知仍须回乡务农，邓小平被安排去井冈山做革命“怀旧”之旅，意谓复职在即，年底，周恩来在四届人大大胆宣布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为观看全国美展。首都空旷宁静，古意苍苍，正是意大利人被允许入境拍摄《中国》期间。

1975年邓小平施政展开，其中包括有限放宽并调整下放人员政策，我的私人变动是转赴江北落户，趋近上海，南京就在长江对岸。

1976年元月周恩来死，三月邓小平下台，四月，南京北京相继爆发庞大骚动——我目击金陵城数十万工人借周恩来之死游行抗议，一路花圈高及树顶，浩浩荡荡——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开始的一幕。不久华国锋上台，十月，四人帮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国恢复高考。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中央适时正名，历年积欠累累冤案的平凡昭雪，闪现希望：毛终于走了，为文革时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运动数百万旧案的一举重议，在是年中央文件中显露契机。

1978年秋，北上就学。深秋，西单民主墙贴出第一份民间政论，并呼吁邓小平复出。冬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宣布告别政治运动。年底，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春，中越开战，西单墙被封。文革末期临刑时被切断喉管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忽然成为是年被隆重宣扬的人物，中国美术馆为之举办专展，纪念活动随即被抑制，相关连环画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艺术团伙亮相受阻，上街游行。

这是一份被重复无数次的大事记，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无不仰赖国事的松紧与宽严，攸关亿万人的命运：命运就是公章——平反、出狱、回城、复职、退赔私产、准予高考、作品开禁……工人的奖金、农民的集市，终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琐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

式磁带辗转录制邓丽君的歌声……离散的人团圆了，到处是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刘少奇平反大会迟至1980年），控诉、涕泣、失态、过度惊喜、卑怯的感激——总之，一切的一切取决于公章和准许盖章的命令。农场朋友曾描述这等传奇：场部抽屉锁着公章，如玉玺，万难启用。1977年允许回城的国家指令下达了，为一拨拨申请人分别盖章，不胜烦，场部用一根长长的橡皮筋栓住图章，吊起来，大门洞开，四乡来人随时进入，一把扯下，自行盖章，盖妥了，命运的皮筋随即弹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间，虽然各省旧案的审断仍将案犯执行枪决，其中许多怨鬼稍后便属革命英雄。然而那时国家陶醉期间的总情绪可以概括为获颁大赦令，而党的语言甚至将1976年喻为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解放”——若非严厉的讽刺，显然这是全党共识：当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须陨灭、身死，这才换来二次大解放——“解放后”的成年人个个扬眉吐气，悲从中来。久违的文艺名流陆续出台，苍老、衰败，动辄哭笑，引吭高歌，近于疯颠——我们的好总理啊！你在哪里——扮演白毛女的老区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几度哽咽，收音机长时间录播她的泣不成声，还有超长的不断被自己打断的感言。

1978年，华尔兹舞曲带动第二次解放感带来的集体晕旋，在场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岁上下，我辈不会跳，对这一延安时期和建国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贴墙围观。第一学期的课外记忆是终日寻看内部上映的西方电影——凡事略微开禁，中国人的活力火速窜升：文革末期各省已闷着偷看若干“内部电影”——第一次目击全裸女子的彩色电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裤档登时鼓起；卓别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肠胃抽筋，我强忍绞痛，以全部体能继续狂笑。

那年最庄严的单项记忆是中央电视台首播李德伦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虽然早就偷听古典音乐，但中国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错觉中似乎只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听——此刻这些弓弦在中国奏响原本发自它的语言。不久，傅聪与小泽征尔被郑重请到，以亚洲脸作为视觉过渡，在七十年代初开国门面对西方时，可谓入情入理，我接连三场混在红塔礼堂聆听排练《第九交响乐》，当“四海之内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来，忽然我想起赣南的村民与荒山。

那时，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W潮、美国嘻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柯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柯西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彼得·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与知识和艺术的可怜纠缠，当我后来去到域外，总算明白自己几乎是野蛮人。因此1978年上学后的发现值得一说：原来京城文革期间竟有诗人团伙、地下艺术家，以及早就试图谋反或治国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关传说，最集中，最传奇，几乎获得唯一的叙述与被叙述者，是北京群体。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流传书单，江南闻所未闻：《麦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条军规》，还包括猫王与约翰·伦农的唱片……首都文艺高干子弟可能是这个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乱世聚散，他们是共和国第一拨青苗，也是头一代忤逆的人，他们和父辈一样，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诚哉居江湖之远而思庙堂之高，看来儒与我党的混合基因，不绝如缕——在几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忆中，他们研读内部刊行的西方政治、历史与经济译作，年纪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国务院的眼光思路，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了。

而当时转亮，有人活着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怀抱纯净的绝望，熄灭了：1976年12月，穆旦写出七十年代无可替代的诗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该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还是“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我默念，不像读诗，而是面

对死者的遗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极深处的真实，以性命承受这真实感，并非我辈，而是上一代人。

诸位：倘若我们当年不是十七八岁，而是身为父辈或祖父辈的老人，该怎样讲述七十年代？会不会愿意讲述？

在各种文革回忆文字中，我留心受难者的年龄和死去的年份。淹没的平民算不清，没人说，广西河滩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却说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后，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相继恨恨而死，火葬时不具名姓，惟有编号。问题不在寿数，而是：有谁在七十年代进入晚年么？那是老来遭遇的大劫、地狱、没顶之灾，且无可逃遁。穆旦，还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顾准，当他们在七十年代写着诗与文，正是我们现在的年龄：现在，七十年代早已退远，我们苦尽甘来，但对于穆旦顾准，那十年是迎面而来的深渊：并非死亡，而是覆灭，“多少人的痛苦随身而没”。

冯友兰，梁漱溟、胡风、周扬、沈从文、巴金……不少高寿的人物活下来，经落实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个院子或公寓深处，但看晚岁照片，给很深很深的绝望堵着，吐不出，咽不下，郁结为神色，显然难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恶与毁劫；他们过去各自守护的主义、志业，似乎无助于七十年代给予的大绝望。严厉整人从无笑脸的周扬，晚年词汇总算出现“人道”，这迟来的良知，等同空话，令我厌恶，其实和以上几位曾在他鄙视与掌控范围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坏：秦城监狱蹲了九年。

“这世界会好吗？”在生命终点，梁漱溟瞪着失去焦距的炯炯双目，如是说。

如今回来分羹的海龟人士有福了。悬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苏联回来报效祖国的前辈，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老舍，傅雷，即选择自我了断，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现在知道他们在外面黄油面包吃过，回来是什么意思，什么感觉，他们真的爱国家。我辈的品学怎与前代比呢，他们中有人便这样收场了。

穆旦还参加过抗日远征军，并曾留学美国。

比穆旦辈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约四十多岁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严，得享晚年，但我记得1966年文革风动，父亲日常答非所问，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书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岁了，一事无成”说这话时，文革才刚开始——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无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先生，仪表非凡，学生时期即地下党员，文革初被侮辱痛殴时年仅三十多岁，几乎死，而父兄俱死。1978年初见我，他端详片刻，说：你们可没给耽误啊！

是的。1976年后的中年长辈与悲观和时间展开持续博弈，或委身才学之外的去处。但那种奋然豁达，在深处，仍出于七十年代无可挽回的失败感——上一册《八十年代》叫我辈谈论，这本书的叙述者仍是我们，这是一种权利么？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说，本书不过滴水。要寻求别种辈份的叙述，却也为难：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确，中南海几代主事者则大不情愿，他们苦心给政权换一付面孔，即巴望甩脱七十年代的阴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周一辈，那是无尽凄惨，临了个个不得欢颜：从南昌井冈山一路铁血，那是他们的最后岁月了，幸有邓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后来。他曾以七十高龄徒步登攀黄山，可是请邓公谈谈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1973年我听南昌郊区来说，亲见邓小平整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目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艾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艾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帐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人文与道德，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溃散，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与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的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帐滥帐糊涂帐，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已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大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最为优美的内心体验，是在那十年。什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那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常态时期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日后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经历与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剧情，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 原载《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主编：北岛 李陀

~~~~~  
【遥想当年】

一九七六年的记忆

• 朱学勤 •

那一年厂矿还在时行部队编制，好端端的车间不叫车间，要叫“连队”。我所在的供水车间就有“指导员”姓崔；还有“连长”姓范。老崔有人文气，甚至文人气，好琢磨思想，也善做思想工作，属“造反派”；老范属典型的技术干部，干巴巴，硬绷绷，强调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属“保守派”。“指导员”和“连长”有矛盾，我这个小青工是后来才感觉到的。

老崔安排我出差，去黄河北岸封邱县调查一位老工人的家庭情况，看看是否要给他困难补助。我插队落户出身，对农村困苦不意外，但常师傅家穷得连案板都没有，是把锅盖反过来擀面，我那碗面条捧在手里蹲在地上喝完，一冻二饿，内心震撼不已。回来后把锅盖擀面条写进报告，老崔很欣赏，认为观察细微调查得力，可以培养。

老范借我很多技术书籍，还讲述50年代初在大别山一带做地质勘查的探险经历。他说那时还真有特务活动，有一次举望远镜观察对岸山林，就发现有一个农妇头顶食物，推开树枝，钻进了一个山洞，忽然不见了。但我认为未必是特务，那洞里也许只是一个相好，农妇带食物进去幽会？

批林批孔运动还在继续，工人开会要批判老范的“管、卡、压”，老崔则回避，不阻止，也不露面。那一次也是如此，临开会，老范突然要我去他宿舍，说头一天在屋里烤火取暖，可能中了煤气，看来只能回开封家里养病。说完让我打电话，他在电话旁边等。我在电话里找了一大圈，终于找到老崔，就问：老范病了，要回家，是不是送回开封？老崔被我催得太急，没有转圜余地，只能违心同意。等到我送老范回来，老崔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厂里夜夜开会，造反派“帮助”老干部“转弯子”，叫“思想交锋学习班”。老崔一度推荐我参加，作为青年工人代表。我当时满脑子反官僚反体制的反叛激情，却体会不到一轮权力再分配正在“思想交锋”的两边悄然出现。新干部的领袖人物叫王世忠，因受过军代表压制，很得我们同情。有一天晚上，我带着一个小本本去找王世忠“谈心”，那本子上全是事先拟好的各种民主概念，不着边际，王世忠听着听着就烦了，我自己也觉得无趣，铩羽而归。第二天老崔就知道，再一次摇头叹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我们从兰考过去的两个集体户，全是重点中学的老三届，思想过剩，精力过剩，一聚会，满屋子高谈阔论。白天干活，晚上辩论，读书读多了，就把厂里发生的运动形势套进来“发挥”，全是过度分析，放大“阐释”，茶壶倒进了茶杯，茶杯撑破了，茶壶还不知。比如那个学习班，一位业余思想家想得太多，听说我参加，就像列宁在十月那样，拍着我肩膀说：“好，你是我们的议员！”当时有毛泽东“走后门未必全是坏人”这一奇怪指示，我们中间发生激辩：是坚持民主反特权，还是维护大局，不纠缠细节末枝？第二天贴出惊天动地大字报，一边引德国哲学为依据，旁征博引；另一边则模仿鲁迅式的讥诮冷峻，笔名曰“迅翁”。我们热火朝天地争，似乎不这样争，明天就会天塌地倾，全不顾工人们读这些文字如读天书，干部们冷冷观察，已经闻着有异味。我因为“政治不成熟”，“议席”荒废，有另一位业余文学家起而代之，确实比我成

熟，逐渐进入核心机密，成为王世忠、老崔离不开的笔杆子。我们的过剩思想就倾泻在他宿舍里，称他为权力斗争放弃了“民主理想”。那位一开始拍肩膀称我是“议员”的思想家，这时挖苦他不是“议员”，而是“领事馆的三等秘书”。“三秘”有一次与我辩论，反唇相讥：“我是诗人，但我只有做诗时是诗人，而你们却在不该做诗的时候都成了诗人！”

他有一句诗我今天还记得：“二十六年桐风起，南风北风何依依。”二十六，年龄；桐风，泡桐树，兰考特产，泛指河南；南风，上海激进派的文革理想；北风，北京老干部的务实取向。何依依，内心矛盾，难定归属。这句诗不仅反映他自己的内心挣扎，也反映了我们这群人的普遍矛盾：文革后期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对南风上层怀疑厌弃，同情北风的务实趋向；而青年人特有的反体制、反官僚的民主追求却还在，又同情基层单位被迫害的失败者。

这种滑稽局面到1976年10月戛然而止。北京发生怀仁堂事变，批林批孔突然中止，掉过头来清查三种人。王世忠、老崔、诗人“三秘”一大群人反过来被请进了学习班，但不是“思想交锋”，而是找了十几孔山区窑洞，分别关押，隔离审查。这时我们在外面欢庆南风上层终于被打倒，同时则担心自己的老同学，甚至鸣不平。而窑洞里的“诗人”则夜夜担心，我们在外面揭批四人帮，是否不知轻重，把大家此前的政治辩论也捎带出来？他的非诗理性在此时还真管用：只交待与王世忠、老崔的工作关系，尽可能不牵扯同学之间的政治辩论。他出来后告诉我，专案组在外面鼓励我们揭批他们，在里面则夜夜逼问他，这群上海来的中学生私下有什么出格言论？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是我对1976年的总体印象。老崔曾恨我不成器，后来他自己成了散淡之人，成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离开化工厂时，去他家道别，他送三句话：“还是做学问好，但不要坐夜，五十岁以后身体不要败坏”，很实在。诗人“三秘”在窑洞里受寒生病，去乡村卫生院打吊针，感动了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女护士，竟发生才子佳人的后花园故事。佳人来厂区找落难秀才，不知他被转移到哪里。我和那位“迅翁”掂着劣质烧酒和自制香肠，陪她去北山口寻找窑洞里的老同学。天寒好大雪，三人走山路，高一脚，低一脚，一步一滑，正好是1976年的最后一天。

□ 原载《民间历史》

~~~~~

【往事如烟】

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

• 葛 岩 •

从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开始，不少曾积极参与文革的大中学生失意于现实。其中的一些人开始阅读禁书，形成今人所说的地下读书活动。这种时为禁忌的活动分布广泛，参与者众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九八〇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是催生日后许多理想主义文化精英的摇篮。《今天》杂志的诗人中，“星星画派”的艺术家，《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中和参与改革设计的策士中，不少人是在地下读书活动时开始了其知识和文化的准备。对此，坊间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回忆和评论。

从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开始至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地下读书活动延续十年之久。其间，“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加上六九到七七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约有一千六百二十三万人之众。可以猜想，精英之外，必有许多普通的青少年也曾阅读过禁书；理想主义之外，青春期反叛的冲动，社会群体身份的认同，现实的利益的吸引，都可能成为地下读书

的驱力。如果将参与地下读书的许多个体和群体的经历积累起来，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现象：即使在严峻的控制下，异端知识依然可能获得传播。为此，我写下自己的记忆，一个普通人和一群普通人获得书籍，阅读书籍，传播书籍的故事。

—

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已满九岁，在住宿制的西安长安路小学上三年级。这所学校前身是为干部子弟设立的延安育才小学。一九四九年后，育才小学的主体迁到北京，一部分迁到西安。北京部分沿用育才小学的名字，西安部分称西安第一保育小学，后改称长安路小学。学生多是党、政、军干部的子弟，也有少量的文教卫生界人士的子弟，我属于后一类。西安还有其他类似的干部子弟学校，如第二保育小学，西安小学，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二附属中学，西安中学等。到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学校被解散，学生转去自己家周围的学校就学。我去的是文艺路小学，后升入第七十一中学（现称西安育英中学）。

大约从小学高年级开始，觉得街上能买到的书没意思，我有了读书——特别是读禁书的愿望。能找到的是家里和大院其他小朋友家中的书，印象深刻的有《中国民间故事》，侦探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还有一本破旧不堪的《斯巴达克斯》。一九六九年底，我随母亲“战备疏散”到渭北合阳县的鹅毛生产大队；父亲也在那里，关在“牛棚”里管制劳动。一九七〇年，我在合阳县中上一年级。那里还有百十号第二机械工业部五七干校的子弟，绝大多数来自北京。合阳中学是住校制，一间宿舍里住二十多人，夜里冷得出奇，电灯也没有，大家就睡在床上轮流讲故事。北京来的一个绰号“老博士”的北京同学读书多，讲得最出色，讲述中还插背些“夕阳无限好”之类的古代诗词，让我无限景仰，直到有一天我吃惊地发现，他竟频繁盗窃同学们的东西。我在合阳中学仅呆了一个学期，因为不遵守纪律，我被叫去站台子接受批判。母亲怕我得到处分，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资格也没有了，慌忙把我转回西安第七十一中学。从此我开始了独立的生活，那时我已近十四岁，去合阳前，我在七十一中学就有了两个要好的朋友，韩特（现从事演艺工作）和王苏川（现为自由职业者）。韩和我住在同一大院，每天喊我一起上学。王比我大一年级，曾是西藏自治区西安保育小学的学生。在初一的时候，王就有过在图书馆偷书进警备区“号子”（拘留所）的经历。从合阳回到西安后，韩特告诉我，他和王又去偷过书和报纸。书拿来读，报纸则卖给废品收购站，换钱买零食吃。

后来的几年，我和王苏川，以及吴乐群、王晶、刘杰、高建民、夏墅、阮雪柏、杨天城和齐文光等几个同校生来往很多。其中高和阮曾是第一保育小学学生，夏则和王一样，是西藏保育小学学生，刘杰则是我在学校篮球代表队的搭档。王苏川聪明幽默，待人温和却仗义，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自己拥有一间住房，是大家常去聊天、抽烟的地方。在这个团伙里，偷书、读书只是交往中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中某人和其他同学发生冲突，大家会提前在学校门口埋伏，截击对方。也有过在夜间出动，打碎别人家的玻璃窗的情形。七三年，王等人中学毕业，下乡做了知青，但我们仍保持联系。除了分享书籍之外，到王下乡的村庄去玩，我们也会一起去偷窃生产队的鸡烧来吃。

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间，这伙学生已经偷窃过许多间大学和机构的图书馆，记得有西安公路学院（现属长安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称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现属长安大学），西安医学院（现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国家测绘总局第一分局，陕西省卫生学校，陕西省电影发行学校，西北工业大学和陕西公安干部学校等。偷盗和阅读的书籍多限于文学名著，以俄国、苏联和欧洲小说为主。我在那一时期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俊友》《娜娜》《九三年》《悲惨世界》《笑面人》《红与黑》《嘉尔曼》《唐璜》《普希金抒情诗歌选》《金蔷薇》等等。当然，还有一本被翻得稀烂的《外国名歌二百首》。读了这些书，平时少不了议论，故记忆深刻，

以至后来在大学念西方文学史时，我不必再专门去读那些古典名著。

在七十一中的这伙少年中，偷书、读书固然有追求知识的一面，但这种追求更多由青春期反叛愿望所推动，偷书、读书、打架、偷鸡摸狗是混合一气的行为，读书的范围也大体分布在文学、娱乐等类别。青春期反叛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对社会规范的挑战，偷盗自然是一类强烈的反叛行为。但同时，书籍在传统价值观念中有特殊的正面价值。对参与者来说，在禁书的时代偷书和读禁书，可能在保留了强烈反叛意义的同时又不至带来过度的道德自责，因此成为一类令人兴奋却又不必付出过多心理代价的反叛形式。

阅读使我获得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杂七杂八的知识，在学校里得到老师的喜爱，同学的羡慕。由于林彪事件发生，一九七二年上初三的时候学校出现了所谓“复辟回潮”；课堂纪律好了些，考试多了，外语、数学竞赛也恢复了。西安市还要求各中学征文，选拔优秀作文结集出版。我和王苏川写了一篇小说拿去应征，并被选中，我们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出版。谁想张铁生事件后，出版停了下来，各类考试、竞赛也相继取消。好笑的是，不久后的一九七三年初，在批判“教育复辟回潮”的运动中，《西安日报》用了一版的篇幅来发表我们的小说，并加了篇意气飞扬的编者按，把那篇小说夸奖为文革教育的成果，用它来反驳认为文革降低了教学质量的言论。小说为我们带来了十几元稿费。王和我约请了几个朋友，到当时西安唯一提供西餐的五一饭店去大吃了一通。

发表小说带来的好处不止一顿西餐。学校还选派我去参加市里举办的讲故事比赛，用那篇小说做故事素材，得了中学生一等奖。碑林区广播站为我录了音，通过街道上的喇叭播放。那时，我的班主任秦永老师带五个班级的语文课。他慷慨地要我负责批改其中两个班级的作文，让我的虚荣心获得很大满足，并开始意识到有知识是件不错的事。以前，课余时间大多是闲逛或泡在篮球场上。这以后，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多。由于毕业后的前景是下乡，班级里很少有人认真读书。我认真一些，老师就很赏识。虽然由于父亲的问题迟迟不能入团，但我同时任语文、化学、数学和外语的四门课代表。于是，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记得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版后，王苏川和我都觉得郭老先生对杜甫的批判难服人心，竟心高气盛地想写篇反驳文章。写来写去，自识学力不逮，只好作罢。今天看来，虽说文革中流行的说法是“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无论学习好坏，读书多寡，最终出路仍是上山下乡；但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好，读书多的青少年在学校中会获得老师的欣赏，同学的尊重，社会环境仍然提供着读书的心理动机。

一九七三年秋，王苏川那一级的朋友们毕业下乡，我和王晶（现为自由职业者）、齐文光（曾任某市外贸局长，现从事民营商业工作）等人则继续上学直到次年夏天。其间，我偶尔还听说过一些偷书的故事。一次遇到王，他骄傲地把有一道道紫痕的肩膀给我看，说是用麻袋扛书时候压出来的。

二

一九七四年夏我已满十七岁。高中毕业后幸免于下乡，一边等分配，一边在陕西博物馆做临时解说员。当解说员的时候，我们一伙中有刚毕业的高中生，也有病退回城的知识青年，加上正式招到博物馆工作的二三十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和西安的老大学生，背景五花八门。负责管理我们的是北京知青吴永祺（现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乐观、幽默，做事爽快并能言善辩，在他的麾下大家都挺愉快。和我常来往的还有一个老五届大学生叫王世平（现任陕西博物馆研究员）。他好谈古论今，总是口若悬河，还能随口报出一连串真假难辨的数据来支持一些显然荒谬的观点，让人叹为观止。王的另一绝活是用两只手同时写字，画简单的图案，大家笑称是“奇技淫巧”。世平看书很多，且能过目成诵。我读书后常会询问他的看法，时有收获。

应该提到的还有一个叫王学三的临时讲解员，绰号“红棉袄”。他瘦且高，说话、衣着打扮都属于街头生猛一族。有趣的是，他身边总带着诗集，最常见的是一本破旧不堪的《裴多菲诗选》，且常念念有词地背诵着：“希望是个娼妓，对谁她都拥抱。”开始我们并没有多少来往。一日，我和一帮有意捣乱的游客冲突，一时间剑拔弩张。学三一边大呼“我是菜市红棉袄”，一边连蹦带跳地扑打对方。那些原本气势汹汹的游客虽不知“红棉袄”是何方神圣，但慑于学三的威猛，落荒逃去。架没有打起来，学三和我从此成了好朋友。

学三家住炭市街后一个叫“菜市东坑”的地方。虽然离市中心的新城广场不远，那里却像个贫民窟。房屋低矮破烂，居民大多是河南移民；或没有正式工作，或干些收入很低的体力活。有一次，我看到警察在那里捕到一个小伙子。其家人纷纷追赶出来大声叫骂。包括一位老奶奶在内的几位女性家庭成员竟敢冲上去和警察撕扯。居民们或站在狭窄的街口表情兴奋地观看，或继续在屋檐下做饭、聊天，熟视无睹。这种和执法机关公开的对抗，这种对警民冲突的漠然是我从未经历过的，直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学三告诉我，东坑每一户都有人被抓过。无法查证此话是否夸张，但居民们的表现似乎说明他们对抓捕已习以为常。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学三却雅好读书。他从我处借阅过一些书，主要是文学书。偶尔，他还会朗读自己写的诗给我听。我还发现，学三在东坑青少年中颇有威望。这自然和学三打起架来冲锋在前有关，也和他总是滔滔不绝，背书吟诗有关。东坑一伙中有个长得虎头虎脑，好勇斗狠的殷姓少年和学三关系最“铁”。虽然不时调侃“红棉袄”是个“大喷壶”（河南省井俚语，“能吹善侃”的意思），殷对学三学识的佩服显而易见。后来，大学恢复招生，学三也参加了高考，但两试不遂。在八十年代中期，听说他离开原交运公司的工作去做小生意。那位殷姓朋友则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因什么案子获罪，被判了重刑。

在博物馆期间，我的主要书籍来源是高小凌（现供职民营企业）。高的祖父是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抗战时病歿榆林后，灵柩返乡（蒲城）路经延安，毛泽东等人曾亲自路祭。高的父亲是省里的一个副局长。他本人曾是第二保育小学的学生，保育小学解散后也升到了七十一中。我从合阳乡下回到西安的一九七〇年，他已初中毕业，被发派到秦岭山中去建设“三线”的襄渝铁路，三年后才到西安柴油机厂做工。高家在机械局的“局长楼”。那里还住着其他一些局长子弟，如王修田、高建民、张效林、李晓黎、贾二强（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贾三强（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兄弟等。其中有第一保育小学的学生，我因此认识了高小凌。小凌为人质朴慷慨，常借书给我。读他的书时我会十分小心，还书的时候会用牛皮纸细心包好书皮，以示好借好还。我从高那里借书长达三年之久。除了读书之外，“局长楼”的诸位，加上国家测绘局第一分局子弟郝俊杰（现供职陕西省税务局）和我也曾扒蹭火车去过华山，骑自行车去过南五台，算是一伙玩伴。

小凌处借到的书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典文学名著，包括不少雨果的小说、全套的傅雷译巴尔扎克等；另一类是所谓“内部书”。文化革命后期，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有在书店买书的特权。小凌的父母有这种权利，且十分支持孩子读书。他因此买了不少。这些“内部书”中，一类是文革前出版的所谓“灰皮书”、“黄皮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据说，最初是毛泽东为了给干部们做“反面教材”而翻译的。第二类书是文化革命中翻译的外文书籍，如《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还有许多当代的文学作品，如苏联的《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绝对辨音力》《艾特玛托夫短篇小说选》，美国的《爱情的故事》《乐观者的女儿》。从小凌那里获得的当代书籍中，有三本书印象深刻。一本是考茨基的，好像叫《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它让我知道那位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社会民主党人有许多见解；第二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另一本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它让我领悟到某

种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善，一种无力但不屈服的善。

“内部书”的另一个来源是一位叫龙海东的朋友（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从事展览设计）。他的父母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培养的党内文化人。其父任西安话剧院的院长，是我父母的同事；其母是省妇女联合会的主任。海东比我大四五岁，我上中学的时候他已经下了乡，做过工，后来被推荐到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他本人，弟弟和妹妹都是第一保育小学的学生。由于年纪差别，在中小学时我们并无来往。我在博物馆做讲解员时，恰好他们班级来参观。我们攀谈起来，从此成为好朋友。

周末，海东常会在其父的办公室里读书。那是个苏联式样的灰色办公楼。办公桌上放着一盏沉重的带绿色灯罩的铜制台灯。大概是从某苏联电影中获得的印象，我称它为捷尔仁斯基的台灯。逢周六傍晚，打完篮球，我会站在球场上仰头一望。如果办公楼窗口那盏台灯亮了起来，我就过去闲聊。聊的内容通常是国际、国内政治，新搞到的书和对书的评价。我还会留意海东在读什么书，然后自己也找来去读。我也开始学他作读书笔记，但总是不能坚持下去。记得那时读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斯诺的《西行漫记》、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及《赫鲁晓夫回忆录》《朱可夫回忆录》等。《怎么办》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小说。大约是觉得“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宣传过于虚伪，大家都对小说中宣扬的“合理的个人主义”很感兴趣，也对俄国民粹派的牺牲精神心怀崇敬。我在家中发现了一幅列维坦名作《弗拉基米尔大道》的明信片，画中描绘俄国十九世纪革命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一条必经之路。我把明信片压在玻璃板下，喜欢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对普列汉诺夫用人类学资料来讨论艺术起源，艺术从功利向非功利演变的《论艺术》印象深刻。十多年后去美国念书，还按捺不住在一次研讨课上介绍了一番普氏学说，不思老师同学都还喜欢。此外，当时也读过《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开罗文件》。作者记录了他和许多世界领袖的交往，其中一章谈切·格瓦拉，特别描述了切在古巴建立起社会主义后的困惑，对新制度必然滋生特权阶层的无奈。海氏的记述让我迅速成为格瓦拉多年的崇拜者。我得到一种印象，相信格瓦拉去玻利维亚是在选择死亡，这种选择透露出那位革命偶像在理想破灭后的绝望。

从海东那里还能借到上海出版的《摘译》丛刊，有外国文学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文学版中的外国电影剧本是我的最爱。从自然科学版中第一次知道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大爆炸理论”、基因改造和绿色革命。我最关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版。那时，法国左派共产党人贝特朗和美国共产党主席保罗·斯威齐正在公开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海东，王修田（第一保育小学和师大一附中毕业生，也是高小凌在“局长楼”的邻居，现从事民营商业），才女王琰（西安中学毕业生，时在由西安美院和音院合并的陕西艺术学院读音乐教育，现在政府机构工作），任大援（北京知青，时为西北大学学生，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和我曾多次很认真地讨论、评价过双方的观点。整体上，我和七十一中的伙伴一起读的大多是文学作品，而和海东交往后，开始阅读哲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著作。

龙海东不但是一个读书论书的伙伴，通过他，我还有机会见到一些比我年长，有更多阅历并十分有趣的人。海东的朋友多是“老三届”，大体上是原师大一附中、二附中或西安中学的学生，或他在西北大学的同学，几乎都有下乡，做工或当兵的经历。记得一次他给我看了一本手抄古体词集，说是师大一附中女生高所作。翻开一阅，妙语连连。读到“脂粉队里，我是女登徒”时，让我觉得石破天惊。请海东约过几次，高总是有这事那事。见到她时已是几年之后，在王苏川家中听她讲对现代诗的看法。那天她告诉我说她早不再写古体诗了，直令我遗憾不已。在海东学校的宿舍里还见到过王岐山（现任北京市长）、张庭皓（现任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任大援、张红路（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和交通大学学生张守明。王岐山原本是在陕西博物馆工

作的北京知识青年，后来入西北大学，再后来去了社会科学院和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认识王时，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际亲和力。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据说，王曾做东将两人约在一起，希望能化干戈为玉帛，不幸未能如愿。和王认识后，我们的交往持续到一九八七年我赴美读书。八十年代在北京读研和工作的五年中，王的住所是我每月必去的地方。一九八六年，经王岐山介绍，我同前不久自弃于世的贾新民分别见面，结果是贾新民做了我的责任编辑，出版了谢长（现移居美国马里兰州，从事 IT 工作）和我为《走向未来》写的一本小书。张庭皓则是温文的学者型青年。他在西北大学时学习考古，并读了硕士。后来，张放弃了去早稻田大学读博士的机会，在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工作，最后做到省文物局长。我在美国做事的时候，赖他和吴永祺的支持，得以先后协助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了刚发现不久的阳陵汉俑，秦俑坑第二期发掘，协助伯明翰和巴尔地摩艺术博物馆展出了秦兵马俑。

中学毕业后与我来往的这伙人中，特别是和海东有关的朋友中，不少有着追求知识的明确价值观，读书的动机已不能简单地用青春期骚动来解释。虽然他们不排斥偷书，但未闻有偷书行为。这些人年龄较长，阅历较多，在大学读书或在文化机构工作，职业环境也可能是读书动机的重要来源。这些人读书兴趣主要在思想类、政治类，而非专业类、工具类书籍，表现出老三届多拥有的社会责任感。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离开陕西博物馆的临时工作去了西安缝纫机零件一厂。分配在拔料车间做学徒，做搬运、酸洗一类工作。开始时我很高兴，满脑子里想象着柯切托夫在《茹尔宾一家》里描写的工人阶级的火热生活，但这种幼稚的幻想很快就破碎了。当时，在领导全国人民批判了孔子之后，毛泽东主席又发动了批判《水浒》的群众运动。每个工厂都有“理论队伍”，每周脱产几天集中批判《水浒》，讨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类复杂的问题。因为我平时读些理论著作，也因为受李一哲的大字报的激励，能把《雾月十八日》中的大段章节背得烂熟，在一次发言后，厂里的慈姓书记对我十分欣赏。他调我到冲压车间，许诺几月后让我负责热挤压小组，做车间副主任，尽管当时我还不满十九岁，进厂刚刚半年。很快我了解到，书记正在和厂长斗法，热挤压小组是厂长的地盘，书记想派我去“掺沙子”。当时，我已经立下摆脱工厂上大学的目标，而上学需要厂里推荐，若书记和厂长中有一人反对，我就无法遂愿。困扰中，一位吕姓护士朋友教我一种升高血压的方法。我试了几次，屡试不爽。血压高了，自然无法去热挤压组做事，于是免掉了车间副主任之灾。与此同时，我参加青年突击队，共产主义义务劳动一类的活动，经常加班加点地干活，被评上了轻工业局先进青年。而我的目的则只是为了能上大学。

和我有书籍交往的朋友中，在工厂参加“理论队伍”，受到领导注意的并非我一人。高小凌、王修田、贾氏兄弟和郝俊杰都在单位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该是和这些人平日读书多，有知识积累，表达能力较强有关。即便在那个时代，读书还是能带来一些实际利益的。不少朋友都因读书多而获得更多的机会，比如，从工人或农民提拔到宣传部门，政工部门，乃至被推荐上大学。此外，在更为深层社会价值观念中，知识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尊重。拥有较多知识者会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某种民间社会的地位，连菜市东坑那样的社区也难例外。

三

一九七六是个戏剧化的年份，其中最为戏剧化的事件该是清明节纪念周恩来的活动、毛泽东逝世和捕捉“四人帮”。清明节的那天，下了夜班，我赶到市中心的钟楼看花圈，阅读悼念周的诗歌，然后又去新城广场。

.....

高小凌的女友蔡蓓是王岐山的表妹，较早得到“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当时中央文件尚未传达。小凌迅速找到王苏川、贾氏兄弟、张效林、郝俊杰、李晓黎、高建民、齐文光、贾永平和我，到一间叫“代代红”的饭馆饮酒至酣。一伙人接着移师到李晓黎在西一路的住所，由时任八十六中学团委书记的贾二强回其办公室取来纸笔，写了几条标语，在钟楼东北角贴出。据贾三强回忆，标语上写着“人心大快，众志成城，省委应致电中央，表达延安儿女的共同心声”。这该是西安市贴出的第一幅有关“四人帮”倒台的标语，立刻引得大量行人驻足围观。李晓黎乘着酒性，站在梯子上，先喊了几句革命口号，接着大呼“打倒江青”，围观人群中附和者众。

.....

回想起来，在动荡不安的一九七六年，我周围的朋友对那场戏剧化的社会变动表现出一致的态度和行为。或许，是读书活动带来的异端思想激发了这种态度；亦或，是这种态度与参与地下读书行为互为因果，一时不好分辨。无需分辨的是，这些人在社会变动过程中都是拥护者，甚至，还试图成为推动者。

四

一九七六年秋天，文化革命终于结束。次年末，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书籍开放的范围慢慢扩大，地下读书活动渐入尾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尾声显得有些惊心动魄。

和海东、小凌等朋友来往的几年里，我的合法的书籍来源扩大了，偷书的重要性随之降低，但原七十一中学一伙学生的偷书依然处于正在进行时。早已从乡下回到西安，在一家纺织厂做工的刘杰放言要光顾许多图书馆，建立一个巨大的私人收藏。刘的雄心获得了不少低年级同学的崇拜，其中包括和他住在一个大院，时在八十六中学念高中的米延斌。大概在一九七六年末，小米带动他的一帮同学开始行动，且愈演愈烈，终在一九七七年春惹出了大麻烦。

大概是四五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和王晶在我家闲坐，刘杰带着七十一中一个史姓低年级学生来到我家，告诉我小米等人偷书被抓的消息。据说，八十六中学四五个学生去离西安市区约四十多华里外的西安美术学院，偷得不少书，满满装了一平板车。在连夜赶回市区的路上，看地的农村民兵将他们擒获。之后的几天内，八十六中学被捕学生迅速增加到七八人，更多的人遭到公安传讯。被捕者中不乏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一类“乖小孩”，令学校诧异，家长恐慌。

预感到自己会入狱，刘杰要求我保存几旅行包书，情也切切地告诉我：“这可是我后半生的精神寄托。”

面对如此深切的请求我却心存犹豫。我猜想，刘被捉后会很快供我出来，接着公安就一定会找我麻烦。但我同时也明白，我无法拒绝刘的要求。在中学的时候刘几次为我大打出手，拒绝他意味着不义气，不义气会让我名誉扫地。结果，我答应下来，和王晶一起在离刘家不远的一个小花园边等候，刘则回家取书。等了很久，黑暗中看到一个低年级姓于的同学跑来，说“雷子”（便衣警察）已经设下埋伏，包围了刘家，刘派他前来报信。又过了一会儿，刘出现了，十分紧张的样子。大家坐了一两个小时，刘决定去自首，但说先要回家去取些香烟。我劝他若要自首就不必回家，免得被“雷子”捉了。身上有四块多钱，我给了他三块四，当时这是买一条三门峡牌香烟的价钱。约在午夜时分，我们几个人相拥告别，挺悲壮的样子。次日，中学同班“死党”齐文光来到我家，说刘在凌晨时分带警察搜查了他的住处，取走了刘放下的几袋“赃书”或“精神寄托”。睡眼迷离的文光狡辩了两句，挨过几下就不敢再吱声了。

刘被捕后，风声鹤唳。王苏川把一些书转移出去后，便在上班时被警察捉去。后几日，我和王晶、齐文光等整天凑在一起，交换着某某、某某相继落网的消息。我虽未偷书，但手里有一些偷来的书。对于没有参与偷书但“赃书”在手的人，警察会去你的工作单位，通过“政工组”或“武装部”一类的机构传讯你，收缴“赃书”并通知单位你的行为。王修田几个朋友都有了如此经历。如果公安去我的工厂如法炮制，我为推荐上大学所做的努力将功亏一篑，真是让我很烦。一天上班前，我把手中五六本“赃书”放在桌上，并给父母留了个字条，说不少同学已因偷书被抓。如果我被抓或警察来家里搜查，可让警察拿走这些书。母亲见字条后立刻赶到工厂，把我拎到厂外僻静处，不断追问我是否参与偷书。无论我如何赌咒发誓说没有，她总是将信将疑。

警察果然去了我家。不过碰巧，负责的警官土改时和我母亲在一个工作队相识。在案件中发现了我的名字后，他决定去我家而不去工厂，而且不穿警服，不开警车。这位警官告诉我母亲，她的儿子虽没有偷书但的确拿了些“赃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来追缴一本叫作《十日谈》的黄色小说。警察们取走所有的“赃书”，包括《十日谈》。那位善良警官还透露，偷书事件所以闹得如此沸沸汤汤，先后捕捉、传讯了二三十人，因为八十六中一伙在陕西电影学校偷走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的一批娱乐杂志，其中有影星蓝萍的报道。当时“四人帮”被抓不久，偷书案件因此被从政治高度来理解。警方推测，偷书人可能是四人帮的余党，作案目的是销毁江青历史丑闻的罪证。当警方发现作案者都是些“小屁孩儿”时，大有啼笑皆非之感。据当年的“小屁孩儿”之一屠坚（现从事影视制作）回忆说，关了半个月左右他们便被释放。这七八个孩子中有五个在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中进入大学。王苏川被关了三四个月，刘杰却被关了一年。

七七年底，全国各考场迎接了大学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考生。十二月十号，我在师大二附中考场完成了最后一门考试。那天，我正好满二十一岁。这之后，书籍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禁忌越来越少，直到今天，书已多不胜读。也在这之后，青少年读书活动被渐渐纳入了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之中。

五

我间接地知道西安还有若干其他地下读书群体，如一些高等院校的子弟，卢伟（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美工，后成为电影剧本作者）为首的居住、活动在大雁塔到小寨一线的一伙青少年，和一些被称为“西安老户”（一九四九年以前在西安有些社会地位的家族）的子弟。各群体成员的背景不同，书籍来源、读书的侧重也有些不同。例如，我知道一些大专院校子弟会更侧重于工具性知识、英语和西方音乐知识，而非哲学、政治之类书籍。通过朋友介绍，我还曾与一位时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读书者交谈过数小时。据当时约有三十岁的他说，他们一群朋友读过大量民间和历史书籍，并在一起持之以恒地演练太极拳。那晚，他熟练地用《易经》《推背图》和一些闻所未闻的古代传说，向我解释共产主义运动、文化革命，林彪事件等。其知识来源和解释方法让当时的我好奇不已，但多少也有些不屑。今天去猜想，这些人或许一开始为后来形形色色的气功、特异功能的兴起做好了民间的准备。

就我身在其中的地下读书群体来说，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中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文革前的干部子弟学校制度使得他们能彼此结识，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城市功能区分方式又使党、政、军，文化教育的大院彼此相邻，便于他们交往，偷窃和传播书籍，而“内部书店”的存在使得这些青少年可借助家庭的背景和权力获得异端的书籍。因此，体制的安排是他们地下读书活动的重要条件。当然，同样的体制也规范着地下读书活动。比较我的故事和其他有关回忆时不难发现，各地读书者阅读到的主要书籍几乎一样，西方古典文学名著、苏联文学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流派的著作。这些读物所以存在，或和一九四九年后我国与前苏联结盟有关，或与“修正主义”分道扬镳后对“反面教材”的需求有关。思想政治领域的书籍则多局限于不同共产主

义流派的争论，其他成熟的社会学说、经济理论和哲学著述则少见于地下读书者的书目之中。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思想的反叛由被反叛了的思想来规定。

□ 原载《万象》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